

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学术论丛

历史视野下的 温州人地关系研究 (960—1840)

陈丽霞 著

A Historical Research on Wenzhou Man-Nature Relationship (960—1840)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学术论丛

历史视野下的 温州人地关系研究 (960—1840)

陈丽霞 著

A Historical Research on Wenzhou Man-Nature Relationship (960—1840)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视野下的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 / 陈丽霞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308-08017-0

I. ①历… II. ①陈… III. ①人类活动影响—环境—地域研究—温州市—960—1840 IV. ①X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139 号

历史视野下的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

陈丽霞 著

责任编辑 王 萍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心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70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017-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总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浪潮席卷世界,对国际贸易秩序及经济的整体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并没有阻碍经济总量的逐年扩大,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资源配置不断突破国界限制,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优的配置方式以及最高的配置效率,国家和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正在成为一种世界经济现象,并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了各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西方国家区域经济活动实践已充分说明,由于生产要素和商品不完全流动性以及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得传统上从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变得单薄。随着外部性、规模经济等概念的引入和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模型中,区域经济的研究正在转向一个新的方向。

区域经济要素的重要方面之一:区位选择,反映的是运输成本、外部性收益递增与产业聚集之间的一种取舍。然而,扩展全球的网络经济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其原因在于网络经济使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无成本、无重量的世界。其中,最受影响的产业就是那些提供无形产品及服务的部门,例如,金融与咨询服务业、软件业、保健咨询业、娱乐业等。在网络经济时代,金融与软件等产业的区位特征,会有悖于原有的区位理论而存在,这就是网络经济对区域经济理论提出的新挑战,这也需要经济学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来源于经济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益的推



动。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具有整合地区要素资源的功能,它对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市场体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进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建立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兼顾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区域经济合作扩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以及经济微观层面产生实际效果而无法逾越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层次。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于长三角等世界级经济发展区域的整合进程来说,要进行基于区域合作层面的战略效应研究。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这一浙江省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浙江大学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方向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模式创新、区域经济转型与升级、区域金融创新与发展。多年的辛勤努力使得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在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自2008年3月始先后出版了第一辑“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学术论丛”共五册专著。经过本中心研究人员的努力,新一辑“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学术论丛(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全面、客观、准确地对区域经济的开放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总结和研究,是意义重大而十分艰巨的任务,本丛书只是在这一方面又一次作了初步的尝试,但愿其能起到相应的学术创新与知识传播的作用,并对关心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的各界读者有所裨益。

张小蒂 黄先海

2010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人地关系:概念及理论背景	1
第二节 本书的逻辑起点及结构	3
第三节 区域范围及地理特征	7
第四节 研究时段的选取	15
第二章 人口增长与人口压力	18
第一节 人口增长概况	18
第二节 人口压力	28
第三节 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人地关系:讨论的延伸	37
第三章 生存冲突与移民	42
第一节 外迁:人地矛盾的微弱征示	43
第二节 南迁和福建移民	46
第三节 自然灾害与移民	58
第四章 土地垦殖和产业发展	62
第一节 土地垦殖与水利设施建设	62
第二节 农业结构的调整	70
第三节 手工业的兴起	84
第四节 商业的活跃	91



第五章 市镇经济	105
第一节 市镇的密集化	106
第二节 赶集与赶会——市镇经济的主要形式	111
第三节 线型集镇布局:区域贸易的路由途径	113
第六章 基于地理特征的区域文化	119
第一节 永嘉学派与重商思潮	119
第二节 耕读文化	123
第三节 宗教信仰	126
结 语	136
附 录	139
参考文献	149
跋	161

图表目录

图 1-1	唐宋时期的温州	9
图 1-2	明清时期的温州	11
表 1-1	1933 年温州主要四县耕地分配情况	12
表 1-2	1933 年温州各县面积、人口数及密度统计	12
表 1-3	1933 年温州四县与浙江省其他县份每农户所占农田亩数比较	12
表 2-1	历代温州人口变化	19
图 2-1	历代温州户数增长	23
图 2-2	人地关系的四个阶段	38
图 2-3	人口压力的双重调节	40
表 3-1	历代温州入迁移民主要姓氏统计	47
表 3-2	平阳县历代外来移民家族分时段统计	53
表 4-1	两宋时期温州重要的水利设施	68
图 4-1	温州赴真腊远航线路图	101
图 5-1	宋元时期温州主要市镇布局图	107
图 5-2	明代温州主要市镇布局图	108
表 5-1	清光绪前温州主要市镇	109
图 5-3	清光绪时期温州主要市镇布局图	110
表 5-2	徽州府由金华至温州府路水陆行程	114
图 5-4	清光绪前温州市镇布局的线性结构图	117



第一章

导 论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的不断认识和开发的过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冲动构成了整个已有社会历史的恒久原动力,它推动人类不断汲取自然资源,合理组合资源并将其用于最大限度地改善和提高自身生存境况的用途。在农业社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汲取、组合与配置主要是基于土地资源及其附着的产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地关系是贯穿整个农业社会人类发展的主导线索。任何对工业社会之前的前近代社会发展问题的审视都无法逃脱对人地关系的或明或暗的思考。

第一节 人地关系:概念及理论背景

人地关系是历史地理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任何关于区域历史变迁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人地关系的审视。^①一般而言,狭义的“人地关系”是指人口与耕地的关系,它意指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耕地)相对人口的丰腴(紧缺)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农业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状况。广义上的“人地关系”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它不仅包括人类直接作用于土地的生产过程形成的生产状况,而且包括作用于土地之外的其他自然资源的生产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生产深化(配置)过程。因此,广义的人地关系在概念的外延上不仅仅包含土地资源状况(土地丰腴程度、移民等),还包括特定土地资源上的土地利用深化(产业发展、城镇发展等)。

就区域经济变迁历史逻辑的研究而言,仅仅以农业耕地与人口交互关系作

^① 参见吴传钧主编:《人地关系与经济布局》,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5页。



为贯穿之线索,即使具有本质上的含义,显然也不足以信服地和清晰地梳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人类活动结构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主体,人类需求的不断满足就是由它实现的。它一般由人口再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文化活动所组成。这些活动控制着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过程。而地理环境因素是从供给方面制约人类活动结构发展的因素。从广义上讲,它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和人文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制约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方式、强度和规模,进而影响到人类再生产活动。人文环境则影响到人类活动的水平。因此,人地关系问题又成为不仅包括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还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定人文环境以及与人文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因此,本书将在主要讨论狭义人地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广义层次上的人地关系,以期勾勒出一个关于这一时期温州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更为丰满的形态。

对于人地关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作为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命题,却是始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将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高潮。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 Ratzel, 1844—1904年)在他的著作《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一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支配作用。20世纪初,拉采尔的思想经过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Ellen C. Semple, 1863—1932年)的著作《地理环境的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森普尔同时代的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E. Huntington, 1876—1947年)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创立了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1920年,他与古辛(S. W. Cushing)又出版了另一部书《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进一步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决定作用。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法国学者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年)提出了“可能论”或称“或然论”,反对决定论的观点。白兰士认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即环境为人类提供有限的、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而人类又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一定选择,从而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他的学生白吕纳(J. Brunhes, 1869—1930年)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不固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随时代而变化。各家学派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了20世纪20年代“或然论”逐渐替代了“地理环



境决定论”，并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20 世纪中叶，美国地理学家巴罗斯又提出“生态论”，强调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近代科学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德国学者施吕特在拉采尔的文化景观概念基础上创立了“景观论”，后经美国的索尔和一批苏联地理学家的推进得以确立。在全球性人地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就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关系进而引申出“协调论”等理论。^①

国内关于人地关系问题的讨论始于西学东渐时期，盛于新文化运动之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中尤以王桐龄^②、胡焕庸^③等学者为代表。之后的研究大都围绕西方的人地关系理论，结合中国的现实而展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使得人地关系理论成为横跨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之一。

第二节 本书的逻辑起点及结构

尽管人地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但是从历史变迁角度来考察特定区域内的人地关系在历史分析的框架中却是相对阙如。国内大量关于区域史的研究尽管大部分也都贯穿了人地关系的内

① 参见王爱民、缪磊磊：《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评述》，载《地球科学进展》2000 年第 4 期；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② 1914 年，王桐龄在其发表的《中国文化之发源地》（载《地学杂志》1914 年第 1 期）一文中具体分析了世界文明六大发源地的地理环境，认为汉族文化发达是由于“气候温暖、土脉肥沃、物产丰饶”。同年，王氏在其发表的《亚洲地理之缺点》（载《地学杂志》1914 年第 2 期）一文中指出：“亚洲为自古文明发源地，最古之文明国，皆起于亚洲。然迄今式微已甚……亚洲之历史所以生此结果者，亦亚洲地理之缺点使之然也。”作者在分析了亚洲的地势、海岸线等特点后进一步指出：“亚洲地理凡可以阻绝交通之条件，无不具备，而内部资源丰富、交通不畅是人民缺乏交流精神的原因。”作者认为，与亚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其“交通便利，而天产物缺乏，故欧人多利用交通机关，以求糊口于四方。其所以富于活泼进取之气象者，职是之由”。1924 年，他又发表了《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载《地学杂志》1924 年第 1 期）一文。作者在该文中通过对气候、土壤、河流、人口等多方面的分析，提出了“陕西为中国开化最古之地”的观点，并认为它“为中国文化发源地”是由于“陕西地理有种种特别优异之点”。

③ 从 30 年代开始，胡焕庸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人口地理的论文。这些论文多是从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等角度来分析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1935 年，胡焕庸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载《地理学报》1935 年第 2 期）一文。文中描绘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了璦琿—腾冲线，并以此划分中国东南部人口稠密区和西北部人口稀疏区。1936 年，胡焕庸又发表了《中国之农业区域》（载《地理学报》1936 年第 2 期）一文。该文是第一次从单位面积的人口容载量与农业生产水平之间的关系着手进行人口地理的研究。



在逻辑,但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大多没有明确的就人地关系展开论述,而是涵盖在区域经济的整体性描述中。郑学檬^①(1995年)对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包伟民^②(1998年)对江南市镇、黄宗智^③(2000年)对长江三角洲及华北农村和王笛^④(2001年)对长江上游等区域社会研究的典范,则都较为明显地贯穿了人地关系理论的线索。

有别于以往的区域经济史的一般论述,本书主要围绕区域人地关系变迁的线索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来详细审视宋以降温州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地区的区域发展逻辑。之所以选择温州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如下的考虑:

首先,学术界对于中国前近代(主要是唐宋以来)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存在“两极化”倾向。即大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心地”^⑤和边疆地^⑥的区域变迁问题。由于中心地区发展的历史是基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而且所遗留的史料相对丰富;边疆地区发展的历史也往往与其特定的军事、外交以及本土的各种因素相结合,因此均容易引起关注。海内外许多学者在近一百年间对这些地区作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之多与水平之高超出了学术界对于其他地区的研究。而介于两极之间的区域却常常被忽略,这种学术关注上的忽略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不具有研究的价值,事实可能恰恰相反。研究这些地区能与中心地和边疆地形成对比,进而检验人地关系的某些理论。本书所论述的空间范围——温州正是这样一个介于中心地和边疆地之间的区域,尤其唐宋以来,它早已是摆脱了蛮荒面貌的新兴地区,但尚无法挤进太湖流域的江南中心

①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院1995年版。

② 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③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④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⑤ 20世纪30年代,有“城市地理学之父”之称的德国学者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其《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经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文化学教授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和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等人的一系列出色研究,这一理论已经被纳入区域历史研究的主要分析框架中,影响广泛。但本章所指的“中心地”有别于市场贸易的核心地,而是指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重心的所在。就其外延而言,唐宋以后,即指资源优越的太湖流域。

⑥ 边疆地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北部边郡和西部边疆等地区的发展进程。



地,笔者姑且称之为“边缘地”^①,即处于中心的边缘。详细梳理温州的人地关系变革逻辑,对于理解其他广大的“边缘地”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可资参考的成果不多。具体就温州地区而言,惟日本学者本田治(1984、1996年)曾对宋元时期温州区域人地关系进行过零星的探讨。^②另外,吴松弟先生(1990年)也曾撰文对温州等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人地关系和经济开发作过学术分析。^③

其二,温州特定的地理条件可以更好地磨合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人地变革逻辑。一般而言,中心地发展中,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往往较少受资源约束。政治动员的要素流动和人地关系变革存在着非理性的局面,即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率往往被政治需要和强制权力的干预所左右,从而无法明晰地展现人地关系变革的逻辑。边疆地的区域人地关系变革,由于人烟稀少,加之边境冲突和军事安全的考虑,内在的变革逻辑也同样被扭曲。而边缘地,较之上述两地的人地关系变革逻辑,受其他因素的干扰相对较小。经济理性因素在人地关系的变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冲动(主要是生存与发展的冲突)直接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流动;资源的开发、人地关系的深化(产业变革)、人地空间的调整(主要是城镇的形成和变革),等等。这些在温州这样一个边缘地的人地关系发展逻辑中都得到了较好展现。

其三,瓯江流域作为江浙地区次于钱塘江流域的边缘区域,是浙江开发较晚的地区。它虽无法与钱塘江流域巨大的资源潜力和区位优势相提并论,但从其下游的温州地区的人地关系的嬗变中追寻缘由,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这对研究浙东南丘陵地带以及其他类似区域的人地关系也具有典型意义。^④

其四,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温州模式”作为一种

① “边缘地”不同于“边疆地”,它是指中心地的外围地带。

② [日]本田治:《宋元时代温州平陽縣の開発と移住》,载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退官記念中国水利史论丛》(国书刊行会,1984年),第211—236页;《宋代温州における開發と移住補論》,载《立命馆东洋史学》(立命馆东洋史学会,1996年)。

③ 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载《历史地理》1990年第7期。

④ 谭其骧先生认为浙江省南部旧台、温、处三府即椒、甌二江流域,其与南邻福建地形相似,称为东南滨海丘陵地带。他同时认为浙江省的十一府辖境,大致与自然区域相符合。瓯江上游属处州,下游属温州。参见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此文初载《东南日报》(杭州),1947年10月4日,后收入谭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416页。



区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模式而备受世人的瞩目(费孝通,1986年^①;袁恩桢,1987年^②;张仁寿、李红,1990年^③)。当“温州模式”在作为“现象”被人们惊之、叹之、佩之、服之的同时,人们开始追问这一模式何以产生。但是,目前许多关于温州模式问题的研究,在相关历史视角的延伸上,基本是简单地将这种模式与永嘉学派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相挂钩。他们认为,温州模式的形成,除了经济学分析所揭示的种种因素外,事实上它也是历史文化的积累,即温州地区“重商”的区域文化传统在经过悠久的历史年代的积淀,并在碰到特定的外部条件下萌发出的一种颇具特色的地方性专业化生产。温州模式即使不是其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至少也是带有温州地方区域色彩,适合温州区域发展的一种合理的历史选择。这种考察是否符合深邃的历史变革规律,能否给予时下温州模式的讨论以更为深远的背景。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人地关系是一个互动过程,但这样的过程十分复杂,以致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人很难把握因果或主次关系。为了不至于陷入无谓的“鸡生蛋、蛋生鸡”的理论纠葛之中,笔者宁愿采取通常的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分别从环境与人口增长、环境与人口迁移、环境与社会变迁、环境与文化震荡诸侧面来一一探讨,拼盘式地组合成主要发生于前近代时期温州社会中的人地关系变动的轮廓图,并将时间重点放在宋以后至近代前夕这一时段。^④ 全面覆盖温州前近代时期的发展历程并不是本书的工作,笔者更为关注的是人口地理学理论如何结合具体的研究,尽可能全面细致地审视和考察这一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进程和逻辑结构。

本书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导言。第二章首先论述温州地区人口发展的整体状况。由于人地关系讨论的重点是人地矛盾,故笔者在这一章将总括性地讨论温州地区人口增长及其可能导致的人口压力问题。这方面的探讨可以说是考察温州区域社会人地关系的起点。人地关系变革的逻辑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逻辑,即人类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获取效用(资源)最大化问题。因

① 费孝通:《温州行》,载《瞭望》1986年第20—22期。

② 袁恩桢主编:《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应该说,温州地区显著性的变革发生在入宋以后,而且宋之前该区域史料的缺失,也是本书着重选取宋以降至近代前夕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详见导论第四部分)。故本书区别于一般的通史、地方志或行政沿革史,是区域专题史。



而,经济冲突是构成人地关系的基本要素。这种经济冲突在前近代时期集中表现为人类的生存冲动和发展冲动,资源获取的马尔萨斯困境演绎了特定土地上的人口承载及其流向。因此,有关移民问题从来就是人地关系探讨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在第三章集中讨论温州人地关系演变过程中的移民问题。在第四章中,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人地关系的深化问题,也就是区域开发和产业结构变迁的问题。人地关系中,经济冲突的缓解出路除了人口的移动(移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区域深度开发和产业结构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构成了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源泉。当我们将目光聚集于特定区域的人地关系时,就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该区域的长期发展问题。单独的移民潮并不能导致该区域的持续发展,因而势必需要我们从区域开发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作进一步探讨。第五章,我们进一步阐述人地关系的空间调整问题,也就是城镇发展问题。城镇的兴起实际上是区域人地关系深化的空间表现。通过城镇的集聚,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开发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地关系,使人地关系从简单地向土地攫取资源,转变为通过城镇及其承载的交易结点功能来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的能力。人地关系作为一种物质关系,还会在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得到体现。因此,区域文化的兴起通常会深深烙上特定人地关系的特征。这一点在温州地区尤为明显,在第六章中,笔者将就表征人地关系特征的区域文化作一讨论。文章最后将给出一个简要的结论。

第三节 区域范围及地理特征

区域问题的讨论往往会映射及行政区域的讨论。^①任何一级行政建置都必须以一定量的人口和一定的地域为基础,区域行政建置的兴废与多寡是区域人口变动和经济开发的重要标志。历史上,温州地区的行政建置曾发生过复杂

^① 行政区划并不等于自然和经济区划,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对此作过充分研究(参见龙登高《施坚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但这并不排除某些——甚至在多数情况——行政与自然、经济区划的一致性。在帝制时期,行政区划的界限往往与地理单位相重合,“区域即河川流域(drainage basin)”(参见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因为资源、人口、交通、产业是以河川系为媒体组织成立的,故赋予区域以功能性整合的体系是河川系。本书论述所选择的地域是“瓯江下游”,其地域的核心是温州地区的行政境界。



的变化,但基本上均与区域人口的变动过程相一致。每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增殖的时期,区域内郡(府、州)县建置增加,在相反情况下则建置多有裁并。总体考察,其大体经历了两个特点不尽相同的时期,即自秦汉以迄唐末五代,属于郡(府、州)县建置增减变动的敏感期,或不稳定期,而自宋代始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入宋之后,虽然也曾出现过上述情形,但比较而言,是郡(府、州)县行政建置增加、发展与稳定的时期。这恰与温州地区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相一致。

历史上,温州历夏、殷、周皆为瓯地。^① 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全国的当年,在今温州、台州一带和福建境内,设置了闽中郡。闽中郡是浙江地区最早的郡县建置之一。西汉惠帝三年(公元前 192 年),越王勾践的后裔驺摇因起兵帮助刘邦反秦灭项有功,被封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温州永嘉县)。^② 这是温州地区第一次成为封建诸侯的封地。但当时的东瓯仅为汉的藩属,行政上不受汉的直接统治。东汉始元二年(公元前 85 年),昭帝以东瓯国地为会稽郡之回浦县,旧王都为东瓯乡。章和元年(87 年),章帝改回浦县为章安县,东瓯乡也改属之。永和三年(138 年),顺帝于章安县东瓯乡分置永宁县,县治设在瓯江下游北岸(今永嘉县瓯北镇境内),隶属扬州会稽郡。温州建县之始,“地广千里,户不满万”,是个小县,故设永宁长。三国(吴)太平二年(257 年)以会稽郡东部为临海郡,永宁县也改属临海郡。直到晋以前,温州地区基本上还是一个“地僻民淳”的荒凉之地。

西晋初,温州地区出现了三个县级行政机构:永宁、安固(今瑞安全县、文成县一带)、横阳(今平阳县、苍南县及泰顺县一带)。县级行政机构的相续设立,是当地人口数量增加的证明。东晋太宁元年(323 年),明帝分临海立永嘉郡,统永宁、安固、横阳、松阳(今丽水地区)四县,以永宁为郡治。这是温州地区建郡和以“永嘉”^③为名的开始。

从隋唐到五代这 380 年间,温州行政区划变动频繁。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平陈郡废,废临海、永嘉二郡为县,属处州;后三年,又将处州改称括州。大

① 瓯指瓯越,亦称东瓯,系于越族的一支。战国时越为秦所败后,于越人逐渐流散,其中分布在今浙江省南部瓯江流域的,称为瓯越(后世以此作为温州地区的别称)。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中华书局 1982 年点校本。

③ “永者,永长也”,典出《诗经》“江之永矣”。嘉者,美善也。“永嘉”二字,则是“水长且美”,意为山川秀美,社稷永固。该地名宋、齐、梁、陈因之。



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又改之为永嘉郡,治括苍(今丽水),统永嘉、括苍、松阳、临海四县,属扬州。^① 唐武德四年(621年),高祖废永嘉郡为县属括州;次年,以永嘉县置东嘉州,领永宁、安固、乐成、横阳四县。^② 武德七年(624年),改永宁县为永嘉县,乐成县并入永嘉县。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废东嘉州,以永嘉县属括州。上元二年(675年),高宗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县置温州,州名始定,从此温州、括(处)州各自为州。温州管县四:永嘉、安固、横阳、乐成。^③ 天宝元年(742年),玄宗将温州改称为永嘉郡,属江南东道。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永嘉郡复称温州,属浙江东道。^④ (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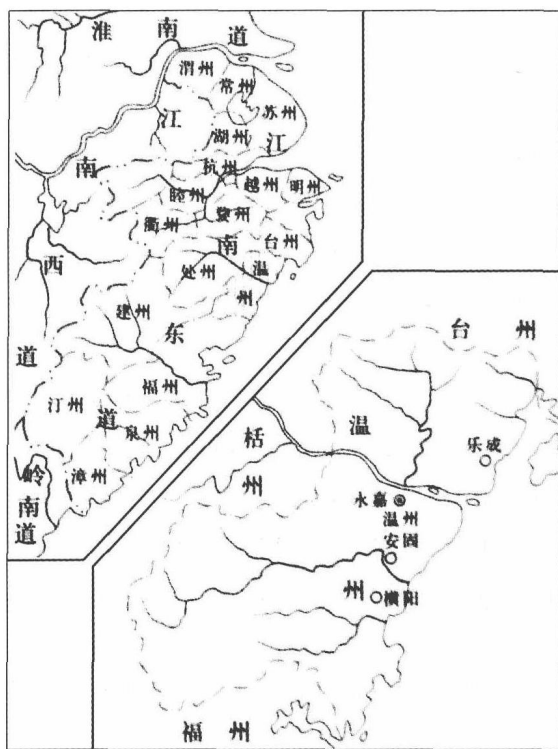


图 1-1 唐宋时期的温州

注:图引自徐顺旗主编:新编《永嘉县志》第一编《建置》,方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9 页。

- ① (唐)魏征:《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永嘉郡》,中华书局 1973 年点校本。
- ②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江南东道十一·温州》,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 ③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七《江南道二·温州》,武英殿聚珍版本。
- ④ (后晋)刘昉等:《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江南道》,中华书局 1975 年点校本。